

王方仁与鲁迅及朝花社停办关系考论

黄江苏

摘要 《鲁迅全集》对王方仁注释有误，王方仁是合记教育用品社创办人王筱堂之子，1936年后以“王福清”之名接掌“合记”，直到1983年仍然在世。朝花社停办是因合记教育用品社“舞弊赖账”说并不可靠，真正原因与当时中国制版印刷的欠发达、朝花社激进的出版策略、上海书业整体环境及“合记”突如其来的撤退都有关系。考察王方仁的文学译作，可见其关心社会进步的抗争精神，与鲁迅之间的精神关联。王方仁的人生，体现了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在文艺与实业救国之间的徘徊与挣扎。

关键词 鲁迅 王方仁 朝花社

作者黄江苏，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浙江金华 321004）。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5)07-0179-11

朝花社是鲁迅晚年在上海培植的最后一个文艺社团，如今学界普遍认为其灵魂人物是柔石，但引荐柔石结识鲁迅的是王方仁。^① 在许广平的讲述中，朝花社是因王方仁而起，又因王方仁而衰，^② 由此可见其重要性：王方仁不仅是鲁迅的追随者，^③ 他也反作用于鲁迅晚年的文学活动。

随着新史料的发现，王方仁的人生履历和历史形象亟需重写，从中亦可见鲁迅与1920年代中国文坛诸多信息。1920年代中后期，是鲁迅意欲一掷身中的迟暮、寻求“身外的青春”^④，与青年密切交往、缔造联合战线的时期，狂飙、沉钟、未名、朝花等社团的青年们以各种方式集聚在他周围。王方仁尤富传奇色彩，他出身富家，却与柔石、崔真吾等进步青年追随鲁迅而为弱小者发声，鲁迅也待他为深交密友，日记中时见宴饮共游，并撰文为其译作力辩，正如对文学青年一贯的倾力扶持，可谓文坛佳话。他与鲁迅办朝花社的经历，亦见出1920年代上海商界、出版界和书业环境的种种真容。他游走在“文艺救国”与“实业救国”之间的人生悲剧，折射出知识分子的坎坷沉浮。本文通过史料考辨勘误，以求尽可能还原历史复杂面貌，但最终还是为了像柯林武德说的，“历史学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历史学的价值就在于，它告诉我们人已经做过什么，因此就告诉我们人是什么”^⑤。

① 王艾村编著：《柔石年谱》，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4页。

② 许广平在关于朝花社的回忆文章中说，是王方仁“提议大家来出点书……大家都同意了”，见于《许广平文集》第2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2页。朝花社因王方仁而衰的表述，后文还将提及，不赘述。

③ 他是鲁迅在厦门大学时说的“几个因我在此而来的”学生之一，见《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39页。查王方仁生平可知，他是从上海退学追随而去，在厦大时加入鲁迅指导的文学社团，见于《鲁迅在厦门与“泱泱社”同人合影》，《文艺丛刊》1948年第6期等资料。又在鲁迅南下广州后，决然离开，查鲁迅日记可知他们保持通信往来（他在鲁迅日记中共出现77次），故能重逢于沪上。详见后文论述。

④ 《鲁迅全集》第2卷，第182页。

⑤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页。

一、王方仁生平考证的突破及误说的辨正

虽然与鲁迅有深交，但王方仁在后世的形象却是负面的，这主要有两大原因。首先是被认为应对朝花社的亏损和终结负责。对此，鲁迅的说法比较含蓄：“这是一部分人上了一个人的当”，“不过朝花社不久就倒闭了，我也不想说清其中的原因”^①。而许广平 1938 年写的《鲁迅和青年们》、1959 年写的《鲁迅回忆录》中，则将矛头直指王方仁，认为是王方仁和其开教育用品店的哥哥使诈，导致同人受损。^②此说一锤定音，后世众口一词的讲述，其来源都不外乎此。其次则是史行在《文艺丛刊》第 6 集发表的《鲁迅与“泱泱社”》^③中说，王方仁“已于前年患病死”，更是进一步将王方仁的人生定格，使其再无机会翻身。《鲁迅全集》的注释将王方仁的生卒年写为“1904—1946”，并说“其兄开设的合记教育用品社，因在与朝花社业务往来中舞弊赖账，致使朝花社遭亏损而告结束”^④，显然也是沿袭以上两种说法而来。

但是成说未必可靠，许广平的回忆常有纰漏，如 1959 年所写的《鲁迅回忆录》中，曾误称王方仁“又名育和”，殊不知王育和另有其人，并因此受到极大的牵连，幸亏鲁迅研究专家们明辨慎思，澄清事实，许广平也及时更正错误并登报道歉。^⑤这提示我们历史的复杂性，也提示我们要践行“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⑥的精神。乔丽华 2019 年发表于《上海鲁迅研究》第 3 期的《关于朝花社的合作者“合记教育用品社”》查阅了大量文献，对“合记”和王方仁的研究有极大的推进，并在两个方面挑战旧说：“朝花社的倒闭，与王方仁、与合记肯定有莫大关系，但王方仁是否成心欺诈，让其他几位上当？恐怕很难得出这个结论。”“从前面《申报》的报道可知，合记创始人王筱堂大约出生于 1875 年，王方仁出生于 1904 年，如果像许广平所说合记老板是王方仁的哥哥，那么年纪相差了将近 30 岁，所以王方仁与合记老板的关系究竟是否是亲兄弟也存疑。”但囿于资料的限制，终究是破而未立，让问题悬而未决。

笔者根据乔丽华文章提供的线索，从查找王筱堂、王方仁的档案入手，辗转多处，终于在宁波市北仑区档案馆查到，王筱堂为宁波北仑大碇镇（原属于镇海）人^⑦，但他跟王方仁的关系仍然未知。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联系到北仑的地方文史专家陈一鸣先生，他出示了 2021 年从民间收藏者购得的一份 1937 年印行的王筱堂讣告，确凿证明了王筱堂跟王方仁是父子关系。^⑧陈一鸣并告知，他亦将材料提供给上海理工大学图书馆的王细荣先生，后者于 2024 年 5 月的《中原文学》发表了《〈鲁迅日记〉中被提及的王方仁生平再考》。如此，两位先生解开了尘封已久的学术谜题，纠正了许多人云亦云的讹误。

首先是从许广平回忆到《鲁迅全集》注释所说的“其兄开设的合记教育用品社”有误。“合记”的创办，《王筱堂讣告》说是他“于光绪三十四年与林康侯史量才两先生创办”，《黄浦区志》则说是“宣统元年（1909 年）王孝堂创办”^⑨，时间上略有出入，但创办人是王方仁的父亲而非兄长，则无可疑。根据“讣告”可知，王筱堂有三个儿子，王方仁的确有个哥哥王亨仁。1945 年出版的《上海百业人才小史》对他有简要介绍：“初任事合记教育用品社 现任华中工厂经理。”^⑩华中工厂是王筱堂与林康侯 1935 年创办的文具工厂，王亨仁后来受委派担任总经理兼厂长。由此可见，许广平等人的表述不准确，王方仁有个哥哥曾任事于“合记”不假，但“开设者”却应该是他的父亲王筱堂。

① 《鲁迅全集》第 12、4 卷，第 220、497 页。

② 《许广平文集》第 2 卷，第 23、337 页。

③ 史行：《鲁迅与“泱泱社”》，《文艺丛刊》1948 年第 6 期。

④ 《鲁迅全集》第 17 卷，第 15 页。

⑤ 许广平：《〈鲁迅回忆录〉的一个订正》，《文汇报》1962 年 6 月 2 日。

⑥ 《鲁迅全集》第 1 卷，第 451、447 页。

⑦ 宁波市北仑区档案馆有一份关于王筱堂财物的档案，上面写着其居住地是“大碇镇公社二居会”。

⑧ 《王筱堂讣告》，1937 年 4 月。陈一鸣先生将扫描件提供给了笔者，特此致谢！除了这份讣告，根据后面将提到的交通大学校史资料，查清王福清实即王方仁之后，再根据后面将提到的张元济为王福清母亲题诗等材料，亦能证明王筱堂与王方仁的父子关系。

⑨ 上海市黄浦区志编纂委员会：《黄浦区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第 198 页。

⑩ 许晚成：《上海百业人才小史》，上海：龙文书店，1945 年，第 17 页。宁波帮博物馆编《近代上海甬籍名人实录》重复了这个信息，但却将名字写成了“王亨仁”，宁波：宁波出版社，2014 年，第 13 页。

其次是史行发表在《文艺丛刊》的文章称王方仁已去世有误。《文艺丛刊》被认为是范泉在沦陷区上海所编的“文艺春秋丛刊”系列的一种,^①据范泉的回忆,他是跟许广平一起研究过文坛形势以后,才接手《文艺春秋》编辑工作的,所以这个刊物上常有跟鲁迅有关的文章就顺理成章了。^②至于“史行”,有的资料集称是“史钱掌”,但查无此人;有的认为是1916年出生于江苏宜兴的戏剧家史锦棠,但查他的经历,1938年就到了延安,并且“解放战争期间,历任解放军警备三旅宣传队副队长”等等,不太可能在上海的刊物上发表此类文章。^③后来又说是史济行,^④但未呈现考证过程。查史济行乃宁波人,与王方仁是同乡,与鲁迅也多有来往,被鲁迅痛斥为“无耻之尤”^⑤,按其一贯的招摇撞骗的文氓作风,写此篇信口开河的文章倒在情理之中。^⑥此文没提供任何材料来源,仅凭一句“听说已于前年患病死”,误导学界至今。这里面有多种原因,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乃是,学界都没有意识到王方仁即是后来接掌“合记”的王福清。王细荣根据《王筱堂讣告》《交通大学上海学校附属高等小学二十周年纪念册》等资料查实,王方仁实名福清,以字行,并续考1936年底其父去世后,他以原名接任“合记”总经理,1949年后离沪赴港,80年代初仍有在世的资料记载,^⑦算是正本清源。乔丽华曾比对1947年《仪文》上刊登的王福清及鲁迅与泐泐社合影中的王方仁照片,认为“有几分相似,年龄也吻合(40多岁),可惜那张合影比较模糊,而且名字也不同,无法确定这位继任者就是王方仁”。^⑧如今看来,二者实即同一人。

解决生平疑难的更大价值,在于获得对王方仁社会背景的整体认知,从而深入理解王方仁的行为,准确刻画王方仁的历史形象。这才是更有挑战性的核心问题。许广平将朝花社的失败全归咎于王方仁,奠定了基调,此后学界对他基本都是痛骂,如强英良在既有的资料基础上断言:“王方仁把自己陷在了奸商、流氓的泥坑里,是永远也不会拔身了。”^⑨措辞非常激烈。但我们细察许广平的陈述,其实有很多漏洞和疑点。

二、“纸张舞弊导致朝花社书籍质量不佳”辨疑

许广平1938年的文章里说:“其实最失败的是《近代木刻选集》之类的木刻印本。纸张是A(即王方仁——笔者注)经手的,从他哥哥的店里或拍卖而来,各种纸都有,很多是粗糙的,不宜于印图。而且油墨也恶劣,往往把细的线条遮抹掉,有时墨太浓,反映出闪光,很不好看,然而还有读者。书和刊物,渐渐被人注意了。”1959年的文章则说:“但所用的纸,其实是不合于印木刻图用的,多是从拍卖行兜来的次货,油墨也是廉价的,印出来不是相得益彰,而是一块块、一堆堆不见线条的画,就相形见绌了。”^⑩

这两次回忆都说纸张问题导致书籍不好,却又自相矛盾地说书籍还是有影响。并且也都提到纸从拍卖行而来,但按她自己的说法,这并非王方仁自作主张,乃是创办之时朝花社同人会议的,所以根本不应该作为罪状。再落脚到核心问题,即是否纸张不适宜印图,印出来效果不好,解决办法则是百闻不如一见,事实胜于雄辩。如今复旦大学图书馆特藏书库藏有1929年原版的《近代木刻选集》和《比亚兹莱画选》等,笔者阅览时并未发现许广平所言各种纸张都有、印刷漫漶不清(指整体而言,不排除个别局部处有)的情况。

① 陈子善:《范泉先生与〈文艺春秋〉》,作为序收入《文艺春秋》影印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22年。

② 例如第一集《脚印》中就有李广田的《鲁迅小说中的妇女问题》,1947年10月。

③ 以上信息分别见于苗士心:《中国现代作家笔名索引》,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35页;徐迺翔、钦鸿:《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105页;《中国越剧大典》,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241页。

④ 钦鸿、徐迺翔、闻彬:《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大辞典》,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556页。

⑤ 《鲁迅全集》第16卷,第520页。

⑥ 陈青生:《年轮——四十年代后半期的上海文学》中说:“四十年代后半期,他在浙江象山的一所中学任教,却常常在上海发表有关一批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如鲁迅、郁达夫等的回忆文字……约在1948年前后,史天行靠杜撰编造的‘回忆’以欺世盗名的恶劣行径被人揭发,于是成为上海文坛广为人知的‘文骗子’,此后便销声匿迹。但史天行当年杜撰编造的‘回忆’文字,却比杜撰者本人幸运得多,至今还不时被编选入一些‘资料集’”。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2页。

⑦ 王细荣:《〈鲁迅日记〉中被提及的王方仁生平再考》,《中原文学》2024年5月。

⑧ 乔丽华:《关于朝花社的合作者“合记教育用品社”》,《上海鲁迅研究》2019年第3期。

⑨ 强英良:《谈朝花社的设立与倒闭》,《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8期。

⑩ 《许广平文集》第2卷,第23、337页。

《艺苑朝华》第一辑《近代木刻选集》是鲁迅编印的中国第一本版画书籍，一般认为鲁迅第一次使用“木刻”一词，就是在其《小引》之中，^①鲁迅对这套版画倾注了心血。据《鲁迅著译版本研究编目》介绍，是“16开毛边本，以粉红线带穿眼。铜版纸印版画，米色道林纸印画名及作者，图和画名各列一页。……1981年，为纪念鲁迅百年诞辰，由上海鲁迅纪念馆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按原书重印850册”^②。这是专家的鉴定，说明都是比较考究、价格不菲的优质纸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艺苑朝华》第五辑《新俄画选》，出版乃是在朝花社停办以后，由“合记教育用品社”转到光华书局出版了，但其版式及用纸都一仍其旧，全部五辑唯有装订的丝线颜色各有差别。^③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重印的《新俄画选》等，则在诸多图书馆及“超星汇雅电子书”平台都可见，无论开本，还是版本装订都与初版本无甚差别，看起来都很清晰。2016年，南开大学出版社又据1981年版影印重版了《艺苑朝华附〈木刻纪程〉》，笔者请教了校订者刘运峰先生，他认为从影印再版本的质量，也能反推出原版本的质量并不差。从这些方面来看，许广平所说的王方仁伙同其兄欺诈，在纸张上以次充好，导致“最失败的是《近代木刻选集》之类的木刻印本”，其实站不住脚。

鲁迅还是为朝花社这项工作自豪的，虽然他说“《艺苑朝华》印得不佳，从欧洲人看来，恐怕可笑”^④，但那是相对于国外的原版而言。1934年写的《〈木刻纪程〉小引》中说：“创作木刻的介绍，始于朝花社，那出版的《艺苑朝华》四本，虽然选择印造，并不精工，且为艺术名家所不齿，却颇引起了青年学徒的注意”^⑤。这里面的“不齿”云云，可视为谦辞或讽语，“并不精工”即便是实情，也更多是因为印制的困难，鲁迅后来多次谈到这点，例如为《小彼得》译本写的序中说到插图：“但因为几经翻印，和中国制版术的拙劣，制版者的不负责任，已经几乎全失了原作的好处”，《论翻印木刻》则说：“倘为艺术学徒设想，锌板的翻印也还不够。太细的线，锌板上是容易消失的，即使是粗线，也能因强水浸蚀的久暂而不同，少浸太粗，久浸就太细，中国还很少制板适得其宜的名工。要认真，就只好来用玻璃板，我翻印的《士敏土之图》二百五十本，在中国便是首先的试验。”^⑥但鲁迅1929年3月的书信中说：“中国能印玻璃版的，只有商务，中华，有正。而末一家则似不为人印，或实仍托别家印，亦未可知也。……疑商务馆或当有此设备，然而气焰万丈，不能询之。”^⑦《艺苑朝华》前四本的版权页写着，“上海闸北宝昌路濂溪坊可大印刷公司代印”，从鲁迅后来的书信可知，朝花社当年也是用锌版，所以其印制不可能尽善尽美。但正如上文所说，它已经做到了当时条件下的最好，所以才会“颇引起了青年学徒的注意”，并能够在今后一再被翻印出版。

因为许广平主要指责纸张拙劣，不利于印画，所以这里重点论述了《艺苑朝华》的情况。至于朝花社的其他出版物，如《朝花》周刊及旬刊，“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两种——《奇剑及其他》《在沙漠上及其他》，情况跟《艺苑朝华》相似。笔者在复旦大学图书馆阅览了这两种出版物原版本，刊物与同时期的《小说月报》等大型刊物比较，其纸张、印刷并无明显高下，北京图书馆1981年曾将《朝花》合订本影印重版，在“汇雅超星电子书”等平台都能阅览。“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两种，据专家鉴识，也是“毛边道林纸印，装帧美观”^⑧，其电子版在“超星”“CADAL”等电子书平台亦能查阅到，这些都能反驳后来几乎众口一词的王方仁兄弟俩使诈、导致朝花社的出版物质量不佳的观点。鲁迅为《未名丛刊》拟的广告词说“对于读者，是希望看了之后，不至于以为太受欺骗了”^⑨，他是不会容忍质量低劣的书籍流向读者的。

再从从动机来说，王方仁及“合记教育用品社”也未必存心舞弊。许广平初次回忆中，轻描淡写地说“他哥哥开教育用品之类的店”，容易给读者造成这是个微不足道的小卖铺的错觉，但实际上“合记”是个有

① 董炳月：《樱心者说：论鲁迅的政治与美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第176页。

② 周国伟：《鲁迅著译版本研究编目》，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272页。

③ 张泽贤：《民国版画闻见录》，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6年，第37页。

④⑦ 《鲁迅全集》第12卷，第194、158页。

⑤ 《鲁迅全集》第6卷，第49页。

⑥ 《鲁迅全集》第4卷，第157、622页。

⑧ 秦川：《鲁迅出版系年》，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7页。

⑨ 《鲁迅全集》第7卷，第477页。

分量的大公司。它的联合创办人，是被《申报》新闻称作“文具界巨擘”的王筱堂，^①与时任中华图书公司经理、后来担任过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的林康侯，以及《申报》总经理史量才，^②还有资料说中国近代印刷业的开拓者唐驼也参与了其工作。^③王筱堂与文化出版界众多名流过从甚密，王筱堂的夫人七十大寿时，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曾题诗相赠^④，其女儿则嫁给了陈布雷的弟弟、历任《国民日报》社长、《申报》总经理的陈训念，“结婚启事”上写的介绍人是潘公展。^⑤人既显赫，“合记”的规模也不小，据《黄浦区志》等记载，它是“上海最早文具专业批发店”，其“商品行销全国各地”，“曾独揽武汉文具市场”^⑥。乔丽华和王细荣的文章里综合种种材料，梳理过它从晚清以来的发展壮大历程，包括在汉口、广州、香港、南京等地设立分社，开办工厂，王筱堂和王福清长时间担任上海仪器文具公会等行业组织的董事、常务理事等等。这个被誉为“执文具界之牛耳”，有着“提倡国货，以扶助教育，便利学者为主旨”的企业，的确有不少善举，如1937年11月国民党政府劝募救国公债，“合记”作为上海市仪器文具同业公会主要成员募捐一千五百元，1944年为第七届《申报》读者助学运动捐款五千元等等。^⑦种种迹象表明，“合记”并非唯利是图、臭名昭著的奸商，而是较有社会责任感的企業，例如1946年春的《申报》报道：“八大公司及商务印书馆等，劳方与资方为着待遇的不公平而起纠纷，但合记的资方对劳方却有深切的了解，薪资原定额相当的高，足以维持生活所需，除供给职员以膳宿外，还要安顿职员家属的住所，备有职员的宿舍，不使职员感受到生活为难之苦。”^⑧

按理说，诚信为本的企业方能经营长久，很难想象实力雄厚、口碑尚佳的“合记”，会存心觊觎朝花社的股本，不惜以次充好，必欲巧取豪夺而后快。这样，朝花社亏空、解散的缘由，就还得上别处去寻。

三、重审“合记赖账”说、朝花社的经营策略及双方关系的突转

1931年，鲁迅在《柔石小传》再谈及朝花社：“后因代售者不付书价，力不能支，遂中止。”^⑨许广平1938年说，“卖出去的书，据说一个钱也收不回，几次的添本钱”^⑩。这大概是《鲁迅全集》注释中“合记”赖账说的由来。

但鲁迅说得很笼统，书价是指什么，为何不付书价，不付哪本书的价，还是从头到尾不付所有书价，都不得而知。朝花社成立后高歌猛进，从1928年12月到1929年9月，在十个月的时间里，出了三十多本书刊。如果王方仁与“合记”始终存心舞弊赖账，绝不可能有这么辉煌的成绩，鲁迅也不可能对“合记”褒奖有加。在1929年6月到8月间，鲁迅在书信中5次向北平的未名社同人推荐“合记”，说“合记是批发文具的，现在朝花社托他批发书，听说他就分发各处文具店代售，收款倒可靠。因为各处文具店老板，和书店老板性质不同，还没有那么坏”，“合记寄售书籍，销行似颇好，听说他们发出去的书，欠账是能收到的”，并屡次催促未名社把书寄给“合记”，托其发售。^⑪直到1929年7月13日、11月2日，《申报》都有“合记”代销朝花社书籍的广告，其中同时写到“代售未名社书籍”。如此融洽的合作，怎么突然就变得背信弃义？

① 《文具界巨擘 王筱堂氏作古 今日大殓》，《申报》1936年12月3日，第12版。《王筱堂讣告》亦作如是说。

② 前两处引文分别见于上海市黄浦区志编纂委员会：《黄浦区志》，第1415页；周松青：《上海地方自治研究（1905~1927）》，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第120页。最后一处引文可见于《福州路文化街》，上海：文汇出版社，2001年，第225页；《上海日用工业品商业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09页。

③ 常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常州名人传记》，第168页。

④ 《张元济全集》第4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74页。

⑤ 《申报》1946年4月26日。

⑥ 上海市黄浦区志编纂委员会：《黄浦区志》，第198页；《上海商业》，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852页。

⑦ 乔丽华：《关于朝花社的合作者“合记教育用品社”》，《上海鲁迅研究》2019年第3期。

⑧ 析：《创办文具建设工厂的合记教育用品社》，《申报》1946年3月4日。

⑨ 《鲁迅全集》第4卷，第285页。

⑩ 《许广平文集》第2卷，第23页。

⑪ 《鲁迅全集》第12卷，第195、198页。

所以我认为不能简单地用“赖账”指称“合记”的行为。更可能的是，“合记”计算垫付的成本及代售佣金，已超过了销售所得，所以出现鲁迅说的“代售者不付书价”。如后面将分析的，出版画集的成本极高，而朝花社的本金并不多，所以很可能是“合记”垫付了部分成本，以销售所得偿还。鲁迅后来曾说：“我们每印千五百本。而售去只五百本，售去之款，又收不回来”^①，也能验证。赖账是失德且违法的行为，但按账目计算盈亏是正常的商业行为。从鲁迅说柔石“还得去借一百块钱来付纸账”，自己“即以百廿元赔朝花社亏空”来看，^② 哪怕情绪上难过，但他们在理性上仍然认账。这也说明“合记”的商业行为没有明显纰漏，须知双方出现裂隙的1929年10月，鲁迅还在委托律师向北新书局追讨版税，^③ 如果“合记”明显的违法赖账，为何不一并采取法律措施？有鉴于此，将鲁迅、许广平的表述演化为“赖账”说，明显情绪用事，改变了事情的性质，并有对商业行为简单地加以道德审判之嫌。

事后诸葛亮来看，朝花社的亏损和难以为继，与其激进的出版规模有关，也折射出当时书业环境的恶劣，而与王方仁及“合记”关系的突转，则加快了失败的到来。

朝花社的三个年轻人王方仁、柔石、崔真吾，当时都专注文艺，发力很猛。从1928年12月6日推出《朝花》周刊第一期，到1929年5月16日，共出版20期，并在1929年1月到4月间出版了《艺苑朝华》前四辑、小说集《奇剑及其他》。尽管《朝花》周刊每期只有8页，《艺苑朝华》每一辑只有木刻画12幅，加上文字二十几页，但《奇剑及其他》有近两百页，总耗费的资金应该不少。尤其是《艺苑朝华》四本与《奇剑及其他》，每本都标明印数1500册，这是非常激进的出版行为。目前找不到关于其成本的记录资料，但从鲁迅印制其他木刻画集的信息来看，造价应该不菲。1930年底，鲁迅开始印《梅菲尔木刻士敏土之图》，正文只有十幅画，加上序和目录二页，共印250部，但因为是用玻璃版印刷，鲁迅分两次共付给商务印书馆近四百元。^④ 1934年出版的《引玉集》，跟《艺苑朝华》一样的铜版纸印刷，有67幅图，但只印了300部，在托了内山完造的关系的情况下，也花了340元。^⑤ 以此类推，朝花社成立半年左右，花费应该不少，但根据《鲁迅全集》注释提供的信息，其筹建资金为500元，鲁迅承担200元，在1929年1月10日、20日、3月5日、10月14日各支付50元。^⑥ 如果仅此而已，朝花社的本金根本不足以维持这个出版进度，除非能像鲁迅所期望的：“那印成的从速卖完，可以收回钱来再印第二种”^⑦，但从前面所引鲁迅的话看，只能卖出三分之一。或许正因为此，原本预告出12辑的《艺苑朝华》停滞下来。第五辑《新俄画选》拖到1930年，朝花社已解散了，改由光华书局出版，而且没有标明印数，但肯定不会再印1500册了，后来的《引玉集》《木刻纪程》等都只印一百到五百册不等，^⑧ 说明鲁迅充分吸取了教训。

除了筹建资金，鲁迅在6月16日还增资100元，作为许广平的参股资金，并在10月9日记着“付朝华社纸泉百五十”^⑨。可以说是不断投入，才维持朝花社此后的运转，从6月1日开始出了《朝花》旬刊12期，8月份出版了崔真吾翻译的小说集《接吻》，9月出版了“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第二种《在沙漠上及其他》，11月出版了柔石的小说《二月》及许广平翻译的《小彼得》。不过最后二书虽然在鲁迅心目中仍是“朝花社印行”^⑩，但其时朝花社已然分裂，改为春潮书局印行，原书上并没有朝花社的标识了。除此之外，《奇剑及其他》出版时还预告了“北欧文艺丛书”四本，“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系列的《狂风暴雨中及其他》，“朝花小集”系列的《吉诃德先生》（上部第一册，梅川译），《在沙漠上及其他》出版时又预告了《果树园及其

① 《鲁迅全集》第12卷，第238页。

② 《鲁迅全集》第4、16卷，第497、179页。

③⑤⑨ 《鲁迅全集》第16卷，第155、541、139页。

④ 《鲁迅全集》第16卷，第224、242页。

⑥ 《鲁迅全集》的注释如此说，见第16卷，第122页。但是也没有给出依据是什么。许广平的回忆里也没有说确数，只是说“资本是A、B、柔石、先生四人出的，但因经费不足（每人数百元），又不便叫学生们多负担，于是把我也算作一股”，《许广平文集》第2卷，第23页。

⑦ 《鲁迅全集》第7卷，第477页。

⑧ 张泽贤：《民国版画闻见录》，第65、98页。

⑩ 《鲁迅全集》第4卷，第186页。

他》，《两个伊凡吵架的故事》（果戈理作，鲁迅译），可见朝花社雄心勃勃，计划庞大，但最后却没有兑现。这里面肯定有资金周转的原因，摊子铺得太大，按目前资料披露的朝花社本金，肯定难以为继，除非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前期出的书稳定盈利，“以书养书”；二是朝花社或“合记”持续投入。而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出版书籍盈利何其困难！以鲁迅同时期参与的未名社为例，在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罪与罚》等世界名著，以及鲁迅本人的精品著译《朝花夕拾》《小约翰》等助力的情况下，仍然落到李霁野说“连印本都收不回来”^①，最后关门大吉。鲁迅后来自费译印《毁灭》《铁流》，自云也是“用钱千元，而至今收回者只二百，三闲书局亦只得从此关门”^②。不仅鲁迅一生办七个出版社，每次都赔本，^③ 1929年沈从文和丁玲、胡也频在上海办“红黑出版处”，也是满腔热血，换得血本无归，使得沈从文感叹“看到这三两年来上海方面所谓出版界的一切情形，盛衰盈亏的消息，就更长了多少见识”^④。书业整体环境如此，又因为鲁迅同时期还参与着未名社、北新书局出版的《语丝》《奔流》等杂志的事务，在《朝花》周刊等出版物上发表的作品并不多，鲁迅对其的定位是“介绍东欧和北欧的文学，输入外国的版画”^⑤，这些在当时都算是冷门的方向，市场竞争力并不强，败下阵来几乎势所必然。

尽管自身的经营策略存在诸多隐患，但不否认朝花社的失败跟王方仁与“合记”仍有关联。许广平回忆说王方仁“对于译书事忽然不热心了，颇有十问九不理的样子。在某天，他突然宣布不能继续了，他哥哥的店不肯再代设法，书也多卖不出，后来就把剩下的书由柔石托别的店去卖，款不但收不到，还要每人筹款填补亏空”^⑥。这段话也验证了书的销路不好，但是说王方仁失去译书热情，则难以遽断。《朝花》旬刊最后一期共五篇文章，有两篇是他翻译的，但《在沙漠上及其他》中已没有他的作品，一直预告出版的《吉珂德先生》也没了下文。真正对朝花社构成致命打击的，还是许广平话中的“他哥哥的店不肯再代设法”，实即王方仁及“合记”态度突转，“撤凳子”，退出合作，而这里面王方仁很可能是被动的。

整个1929年，除了过农历新年的2月份，王方仁在鲁迅前几个月的日记中都会出现，并且都是正面的，例如7月25日写道：“夜同柔石、真吾、方仁及广平往百星大戏院看卓别林之演《嘉尔曼》电影，在北冰洋冰店饮刨冰而归”^⑦，但到后面有变化。8月19日写着“上午方仁自宁波来，赠蟹一枚”^⑧，说明这期间王方仁回老家去了。结合许广平回忆里指责王方仁“奔走城乡之间，为他家建立祠堂大忙特忙，看不到他搞出书事业”，或许这次王方仁也是回老家处理建祠堂的事吧，这趟返乡之旅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似乎成了转折点。在此之后，整个9月份，王方仁没有在鲁迅日记里出现，朝花社的事业也走到了尽头：《朝花》旬刊和“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都在这个月出了最后一本，成为朝花社的绝唱。

进入10月，王方仁两次出现在鲁迅日记中。8日，鲁迅托他帮忙取书，像往常多次有过的那样。9日的记录则耐人寻味：“夜方仁来假泉三十”^⑨。这是鲁迅日记中“唯二”的关于富家公子王方仁借钱的记录，上一次是1928年9月7日，“王方仁来，还在厦门所假泉二十”^⑩，可见王方仁缺钱的时间很少。这天的日记前面还有一句“付朝华社纸泉百五十”，应为偿还拖欠。“合记”讨债而王方仁借钱，这意味着什么？似乎“合记”在向鲁迅和王方仁同时施压。在此之后，本年度的鲁迅日记中再也没有出现王方仁，表明双方关系变冷。同月14日，又出现了“付朝华社泉五十”的记录，^⑪ 31日，鲁迅写给未名社同人的信中则明确宣告了“朝华社内部有纠葛，未名社的书，不要寄给他们了，俟将来再看”^⑫。

鲁迅向友人推荐“合记”到8月为止，王方仁回老家是在8月，在鲁迅日记中失去记载是在9月，朝花社的出版事业停顿于9月，10月出现鲁迅与“合记”金钱上的结算，同时对外宣告有纠葛，这就是朝花社出

① 李霁野：《鲁迅先生与未名社》，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216页。

②⑫ 《鲁迅全集》第12卷，第310、210页。

③ 倪墨炎：《鲁迅办出版社》，《读书》1980年第5期。

④ 《沈从文全集》第13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2页。

⑤ 《鲁迅全集》第4卷，第496页。

⑥ 《许广平文集》第2卷，第23页。

⑦⑧⑨⑩⑪ 《鲁迅全集》第16卷，第144、148、155、94、155页。

现危机的时间线。这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已不得而知，历史在这里进入暧昧不明、歧义丛生的状态。首先可能是因为“合记”毕竟是个批发文具的企业，只是看在王方仁面子上才印行、代售朝花社的书籍，如果长时间不能获得利润，它就不愿意再操此副业。其次也可能是王方仁在回老家修祠堂时受到了来自家族的压力，他的父兄不愿意再支持他的文艺活动。王筱堂作为生意人，看儿子沉溺于文艺会觉得不务正业，加上年事已高，也需要帮手。从他 1936 年去世来看，身体状态也可能不是很好，后来他让长子王亨仁离开“合记”去管理上游的工厂，让次子王方仁德国留学归来后接管“合记”，可见其深谋远虑的布局。“合记”未必存心巧取豪夺朝花社的钱款，但为了迫使王方仁改弦易辙，它也可能釜底抽薪，失去这块业务并不会伤筋动骨。10 月 9 日出现了王方仁向鲁迅借 30 块钱的记录，可见他的经济来源受到了影响，这很可能就是家人胁迫他离开朝花社的手段。次年的 1 月 22 日，王方仁再次出现在鲁迅日记中：“夜方仁来，还陆续所借泉百五十，即以百廿元赔朝花社亏空，社事告终”^①。由此可见，王方仁还陆续向鲁迅借过钱，只是没有被记录在日记里，此时他能还钱，应该是与家里人达成了和解，重新获得了资助。而鲁迅即以此填补亏空，并宣言“社事告终”，说明已达成协议，尘埃落定。王方仁此来，很可能还有层用意，即接受了家里人的方案，将赴德国求学，前来告别。因为鲁迅 6 月 4 日记：“得王方仁信，香港发”^②，则已经在路上。当时留学的准备工作，需要耗费不少时间，王方仁应该是在朝花社事甫一终结就开始办理出国，这也能够佐证“合记”以与朝花社翻脸迫使他改弦易辙的可能性很大。当然，也不排除王方仁眼见朝花社的“创业”之路艰难，主动萌生去意，或者“合记”毁约让王方仁无颜以对而一走了之，但这些都难以证实了。因着王方仁与“合记”的退出，朝花社的停办却已成历史事实。

1930 年 9 月、10 月，鲁迅日记最后两次提到王方仁，都是从柏林寄信和书画的记录，^③可见王方仁仍然不忘维持情谊，鲁迅虽然自始至终没有直接责怪他，可是两人之间却再也没有任何交流的记录。

四、在鲁迅感召下的“夏日舞会”

本文非为王方仁辩诬，只是希望尽可能打捞历史碎片，还原历史现场，尊重历史的复杂性，而非人云亦云、非黑即白、简单骂倒。在打破成见和惯性叙述后，王方仁的形象逐渐由扁平到立体，其个人命运折射出的历史意蕴越来越浓郁丰富。

赫尔曼·黑塞的《荒原狼》中说：“实际上，没有一个人是纯粹的单体，连最天真幼稚的人也不是，每个‘我’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世界，一个小小的星空，是由无数杂乱无章的形式、阶段和状况、遗传性和可能性组成的混沌王国。……一个人的胸膛、躯体向来只有一个，而里面的灵魂却不只两个、五个，而是无数个；一个人是由千百层皮组成的葱头，由无数线条组成的织物”^④。王方仁无疑也是个生动的说明。他本来在南洋大学读工科，却偏好舞文弄墨；他出身于富家，21 岁时即有创办私立学校的商业头脑，^⑤却抛开锦衣玉食，跟柔石崔真吾租住在一起，不时翻译些高尔基作品等革命文艺；他以追求光明的形象在历史舞台上亮相，却差点背负“奸商”的骂名完场，幸而新考察给了他挽回颜面的机会。无论是 40 年代《申报》对他的报道，还是《华侨日报》记他晚年将“珍藏的艺术书籍凡千册”捐赠给新亚书院艺术系陈士文教授创办的三远画会，赞扬他“对中西艺术文化之推动与发扬，功不可没”^⑥，都与成见有异。

王方仁还是因鲁迅而留名后世。他是受鲁迅感召的无数青年中较特别的一个，因着坚定地追随鲁迅到厦门大学，并成为鲁迅指导的文学社团泱泱社和鼓浪社成员，后来又回到上海，随侍鲁迅身侧，述作同游，可谓缔造了一段文坛师生佳话。如同鲁迅早年从学矿到从文，他也是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在“文艺救国”与“实业救国”间辗转徘徊的一个，他甚至试图弥合二者，40 年代担任上海市仪器文具业同业公会常务理事，

①② 《鲁迅全集》第 16 卷，第 179、199 页。

③ 《鲁迅全集》第 16 卷，第 210、215 页。

④ 赫尔曼·黑塞：《荒原狼》，赵登荣、倪诚恩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年，第 60、62 页。

⑤ 王艾村：《柔石评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116 页。

⑥ 《王福清赠三远画会大批珍贵艺术书籍》，《华侨日报》1983 年 8 月 26 日。

在会刊上写文章表露雄心：“仪器文具之为用，与文化学术成正比例”^①，可惜锐意进取半生，最后流落香港，悄然离世。在他身上体现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复杂际遇、多重面影。今后如有更多资料发掘出来，他的心路历程和人生抉择，将更值得研究回味，而本文仍只能侧重于他已知的文艺活动作一小结。

目前能查找到的王方仁的创作很少，译作为多。1926年他在校刊《南洋周刊》上发表了三篇作品。后来以“梅川”这个笔名在《语丝》上发表了三篇作品，包括《〈红的笑〉引言》，在《朝花》旬刊有一篇谈《悲惨世界》的文章。40年代以“王福清”之名发表《〈故事新图〉代序》《仪文业前途的瞻望》。此外，乔丽华提出，“岩野”很可能也是他的笔名^②，如果属实，那就还可以算上《朝花》上的诗歌《新冢》及《语丝》上的《进高小去》。

从这些创作来看，王方仁情感充沛，感觉敏锐，富有正义感，堪称鲁迅精神继承者。1926年4月，邵飘萍被奉系军阀以“宣传赤化”的罪名逮捕后遇害。王方仁在《南洋周刊》发表《吊京报及邵飘萍先生》，开头就怒斥：“呵呵！多么残暴/多么专制/多么阴险/多么无理/一切军阀的行为！”^③其后又发表《杂感》谈到“三一八”惨案：“消息传到上海，上海的民众，感到些什么？好像没有关系一般。这种情形，表示上海的民众，没有感情。即使一只狗，若有人踢它一下，最柔弱无能的狗，也要狂叫几声，表示反抗。那正是感情的作用，虽然没有什么效力，比无抵抗的受侮，我觉得总高尚一些。”^④这些血气方刚之词，解释了他何以弃理从文，追随鲁迅到厦门大学，并很快走得很近。王方仁敢说敢做，知行合一，也有几分鲁迅形容柔石说的“台州式的硬气”^⑤。据《申报》消息，1923年，二十岁不到的王方仁就列名于“南洋大学学生赞成驱卢促进董事会”，1927年1月又在厦门大学驱除理科主任刘树杞的学潮中被选为“执行委员”^⑥，他在1927年的《语丝》上还批评南洋大学的“反赤”^⑦。从这些看来，他的思想中始终有反抗强权、追求自由、做急先锋的一面。也正因为有这一面，所以他出现在《畸形》半月刊创刊号上，也就不是费解的事。这份杂志知者不多，只出版了两期，创刊号上王独清写给龚冰庐等创造社成员的《致畸形同人书》说：“现在虽然我们还不能产生真正的，完全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但是只要我们能够克服自我，极力去获得无产阶级的意识，那我们总能把我们这腐败底阶级的衣裳脱去，赤裸裸地站在无产阶级底战队里面，到那时我们底文艺作品也就要化畸形而为健全”^⑧。在这本实际编辑者为潘汉年的刊物上，^⑨王方仁以笔名“梅川”发表了《海水》，由此可见，身为富家公子并不妨碍他亲近左翼的革命作家。在1928年的《随感录一〇六 民众的娱乐是什么》中，他揭露故乡镇海的官员，自命是北大数理系的高才生，以“科学”头脑下令阻止乡民的迎神赛会聚集，起冲突后在没有示警的情况下开枪打死乡民，痛陈“死者是死了，老爷们还是老爷们”，并力辩“信教自由”，

① 王福清：《仪文业前途的瞻望》，《仪文》1947年创刊号。

② 乔丽华：《关于朝花社的合作者“合记教育用品社”》，《上海鲁迅研究》2019年第3期。乔丽华的思路是，因为1926年的《鼓浪》出现的其他文章作者都可以确定身份，唯有“岩野”不知道是谁，而王方仁是鼓浪社的成员，所以“岩野”很可能也是他的笔名，在1928年的《朝花》《语丝》这个笔名又继续发表作品，尤其是《语丝》上的《进高小去》，主人公叫“仁”，是宁波镇海人，更加大了这种可能性。我对此信疑参半，《进高小去》很难说是散文还是小说，它的主人公的父亲是个农民，这与王方仁的家世明显不符，因为《王筱堂讣告》里说他光绪丙申（1896年）就去上海经商了，所以仅凭此文还难以判断。但是另有个细节能支撑这个观点，“岩野”译普里希文《单恋》（《朝花》周刊1929年第15期），后记说“译自美国‘Dial’杂志1928年9月号”，梅川的《保加利亚通信》（《朝花》旬刊1929年第1期）也声称译自此杂志1929年1月号，从对这个杂志的关注看，二者也可能为同一人。但棘手的是，在《申报》上也能查到有个名为“岩野”的写作者，从种种迹象来看不似王方仁，所以还是不能完全排除此笔名另有其人。

③ 王方仁：《吊京报及邵飘萍先生》，《南洋周刊》1926年8卷8期。

④ 方仁：《杂感》，《南洋周刊》1926年8卷9期。

⑤ 《鲁迅全集》第4卷，第496页。

⑥ 分别见于《申报》1923年4月11日、1927年1月17日。

⑦ 梅川：《来信照登》，《语丝》1927年第155期。

⑧ 独清：《致畸形同人书》，《畸形》1928年5月30日创刊号。这本杂志仅能在国家图书馆的近代图书数据库里查到部分电子版，笔者多次致电工作人员搜寻整本未果。引文出自《独清文艺论集》，上海：光华书局，1932年，第63页。

⑨ 聂家昱、高波：《期刊版本研究》，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第135页。

“赛会之事的唯一目的还是为乡民的娱乐起见”^①，为哀苦无告的底层人伸张正义与权利。其思想与情怀，与鲁迅《破恶声论》“伪士当去，迷信可存”^②的主张一脉相承。

王方仁主要的文学活动还是翻译，并且也明显地受到鲁迅影响。在《朝花》上，他以梅川的笔名发表了23篇译作，如果算上岩野的笔名，就有27篇，多于崔真吾（采石）的20篇，柔石（金桥）的24篇（包含翻译和创作）。同时，他在鲁迅编辑的《奔流》上发表了6篇译作，包括鲁迅为易卜生百年诞辰纪念增刊组织5篇译文，列名于郁达夫、林语堂之间，王方仁独译了2篇。此外，《语丝》《大众文艺》《小说月报》上都有他零星的译笔，鲁迅还曾调侃“近两年来，梅川君正在大发《DonQuixote》翻译热”^③，朝花社的广告也曾预告“在印”，可惜最终没有面世。

从这些译文来看，他的阅读面极广，涉及古希腊、苏俄、英国、西班牙、匈牙利、保加利亚、丹麦、挪威、瑞典等十几个国家，风格差异也大，既有高尔基、裴多菲这类高扬革命精神的作家，也有比昂松、延森等获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温和的人文主义者，显示出那个年代上海文学青年令人惊叹的世界视野。从朝花社的广告看，王方仁曾负责“北欧文艺丛书”中的《瑙威短篇小说集》翻译，他对挪威作家用功较勤，但最有分量的译作还是俄国安特列夫《红的笑》。鲁迅从青年时期就钟爱安特列夫，《域外小说集》中有他的《漫》和《默》，后来也翻译过《红笑》的一部分及别的产品^④，一生中有二十多次提到他，并不遗余力帮助李霁野等年轻人翻译他的作品。王方仁的译本，算是完成了鲁迅的未竟之业，曾得到鲁迅的校订，并由鲁迅推荐给《小说月报》，后来由商务印书馆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出版，当发生有人指责抄袭的风波后，鲁迅还写了很长的辩护文章，^⑤这是最能体现鲁迅对王方仁的爱惜的一次。有趣的是，王方仁为此译本写的《小引》，首先是对安特列夫的介绍，认为“几乎他的作品，都表示空虚，无意，虚伪，但他的中心思想还极力想解决诅咒生命的理性及赞美生命的感情之不和”^⑥，与鲁迅曾评价的“全然是一个绝望厌世的作家。他那思想的根柢是：一，人生是可怕的（对于人生的悲观）；二，理性是虚妄的（对于思想的悲观）；三，黑暗是有大威力的（对于道德的悲观）”，^⑦根底相通。而且尽管已有鲁迅的犀利反击在前，王方仁的《小引》仍用了半数篇幅在痛斥抄袭的污蔑上，颇得鲁迅“费尔泼赖应该缓行”的精髓。

总体而言，1930年之前的王方仁，说是鲁迅的得意门生绝不为过，有人比较过崔真吾和王方仁与鲁迅交往之不同，认为后者“才进入了鲁迅的生活圈子”，“鲜活丰富多了”^⑧。这更让人扼腕叹息，假如没有后来的转变，现代文坛也许多员健将。但或许是念着早年千里投奔的特殊情谊，以及后来翰墨生涯间的心灵契合，所以即便在不欢而散之后，鲁迅也从来没有点名道姓批评过王方仁，与他对高长虹、韩侍桁等年轻人的态度截然有别。王方仁形象的恶化，是在许广平的回忆录之后，后来很多人甚至把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中那句“我有时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⑨坐实到王方仁头上，实际上并不严谨，有点火上浇油，义愤填膺过头了。

在漫长岁月里，王方仁从来没有公开辩解过。^⑩非但是不辩解，他此后就再也没有以王方仁、梅川之名行世。若不是到了1980年代，《华侨日报》报道：“王氏现届八十高龄，眼力衰退，而子孙在美国致力于科学与商务，皆卓尔有成，虑所藏书籍日后散失烟没，于确悉该会近来积极筹设艺术图书馆后，慷慨悉数捐赠所藏，以为响应”^⑪，我们根本不知道人间还有他的轨迹。他似乎情愿如1940年代的谣言那样，让自己的某个部

① 梅川：《随感录一〇六 民众的娱乐是什么》，《语丝》1928年第4卷13期。

② 《鲁迅全集》第8卷，第30页。

③④⑤ 《鲁迅全集》第7卷，第165、125、125页。

⑥ 安特列夫：《红的笑》，梅川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7页。

⑦ 《鲁迅全集》第11卷，第517页。

⑧ 施晓燕：《鲁迅与朝花社众人的交游》，《上海鲁迅研究》2018年第4期。

⑨ 《鲁迅全集》第4卷，第496页。

⑩ 许广平1959年的回忆中有一句：“还听他向人说，是鲁迅误会了他呢”。可见也许有私下的辩解。见《许广平文集》第2卷，第202页。

⑪ 《王福清赠三远画会大批珍贵艺术书籍》，《华侨日报》1983年8月26日。

分死去，永远尘封。他以梅川的笔名发表的最后一首作品，是卡尔弗尔特的一首诗。彼时瑞典诗人刚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桂冠，他即从德国寄回译稿，就像那最早报春的布谷鸟。王方仁从众多杰作中挑选了这首《Sommertanz》，它以这样四句结尾：“我舞过了一个夏季，/那是我唯一的夏季，/于是我也老大了，/于是一切过去了。”^① 我想这是他在其中寄寓了特别的心中款曲，他以此诗怀念了在鲁迅身边侍弄缪斯的日子，那是他生命中的高光时刻，是他难忘的 Sommertanz——夏日舞会。

[本文为教育部青年项目“‘鲁迅与德国文化’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23YJC751006)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张 曦)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ang Fangren, Lu Xun, and the Closure of the Zhaohua Literature Society

HUANG Jiangsu

Abstract: The annotation of Wang Fangren in the Complete Works of Lu Xun is incorrect. Wang Fangren was the son of Wang Xiaotang, the founder of Heji Education Supplies Company. He took over Heji under the name “Wang Fuqing” after 1936 and was still alive until 1983. The closure of Zhaohua Society was due to the unreliable claim of “fraud and default” by Heji Education Supplies Company. The real reason was related to the underdeveloped plate making and printing industry in China at that time, the radical publishing strategy of Zhaohua Society the overall environment of the Shanghai book industry, and the sudden retreat of Heji. By examining Wang Fangren’s literary translations, it can be seen that his spirit of resistance for social progress is deeply connected with Lu Xun’s. Wang Fangren’s life reflects the tragedy of intellectuals struggling between literature and industry to save the country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Key words: Lu Xun, Wang Fangren, Zhaohua Society

① 卡尔弗尔特:《Sommertanz》,梅川译,《小说月报》1931年22卷12期;标题为德文,意为“夏日舞会”。